第 54卷 第 6期
2001年 11月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Vol. 54, No. 6
Nov. 2001, 645~ 652

● 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其最新成果[20]

韦 建 桦
(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 100032)

[作者简介] 韦建桦 (1946-),男,江苏江都人,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教授,译审,主要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研究和编译。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使科学的理论在每个环节上都带有民族的特色,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获得人民群众拥护并取得指导地位的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领悟并掌握了这个真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任务,并围绕这一任务进行了 80年的实践。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种实践中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现时代实践中产生的最新成果。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三个代表”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 06-0645-08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强调,每个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都有自己的特点。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实践深刻地指出: “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第 777页)。基于这种认识,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使科学的理论在每个环节上都带有民族的特色,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获得人民群众拥护并取得指导地位的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领悟并掌握了这个真理,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任务,并且围绕这一任务进行了 80年的实践。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种实践中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卓越成果。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使我们受到的深刻启示。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 “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对中国共产党 80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同时也是指导我们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局面的重要原则;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并结出硕果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指明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正确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归根到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江泽民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0] 收稿日期: 2001-08-25

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高度概括和科学界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的准确阐释。回顾我们党走过的风雨历程,重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发展史,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论断,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作为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指针,而不是当做现成的教条;就是坚定不移地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制定适合中国特点的路线方针政策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他们的科学理论确定的逻辑起点和本质要求。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从事革命理论研究时就明确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第 433页)。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生中始终坚持这个原则,同形形色色的教条化倾向展开坚决的斗争。他们一方面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方面反对某些人把他们的理论当做“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在他们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第 248页)。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历史环境,“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4](第 659页),或者把这些原理“当成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4](第 688页),甚至把它“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4](第 692页),那么,这些原理就会成为抽象的玄想,就会丧失真理性和生命力,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告诫欧美工人政党的领导人,不要把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到处搬用,当做超越一切历史条件、应对一切历史事变、适合于一切历史环境的“万能钥匙”。为了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政党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殷切期望各国共产党人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来运用这个理论。

1885年,恩格斯在致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4](第 669页)。恩格斯提出的这一原则,并没有被查苏利奇时代的俄国革命家所理解。只是到了 20世纪,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这一科学原则才得到了贯彻。

列宁在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艰难而又伟大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获得胜利的理论。这一理论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帝国主义的绝对规律,这种不平衡急剧地改变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对比,必然导致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战争使交战各国彼此削弱,从而在帝国主义链条中造成薄弱环节,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这个薄弱环节爆发并取得胜利;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往往是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在那里最容易出现成熟的革命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及时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同盟,抓住时机,采取行动,革命就会获得成功。这些话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过的,是新的语言、新的思路、新的判断、新的策略,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具体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新结论。这一崭新的理论是引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指针。如果列宁从本本出发,从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出发,甚至从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那就不可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又复杂的问题”[5](第 162页)。列宁反对“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俄国国情相结合,从而不失时机地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胜利,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革命实践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中国共产党 80年的历程,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是毛泽东同志在 1938年正式提出的。在这一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但这一进程实际上从我们党成立以后就已经开始。从那时起,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思想同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就展开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和较量。这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探索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造成的许多挫折失败和流血牺牲中逐渐觉醒、逐步认识真理的过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实践经验、集中全党智慧,不断纠正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反对和摒除左倾教条主义的过程。

列宁早就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6](第 778页)。事实正是这样,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于是,当初摆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前的严峻问题又同样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是从书本里还是从现实中寻找问题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经过长时期的探索和奋斗,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在这个长时期中,毛泽东同志确实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得非常好,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但采取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由于充分尊重中国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7](第 254页)。

充分尊重中国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也是邓小平同志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坚持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探索。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许多重要文章,提出了不少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思想。但是,毛泽东晚年发生了重大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正确地分析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分析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显示出无限生机和活力。

党的 80年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一旦被全党所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只有始终明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才能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分析中国的现状,展望中国的未来,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人民群众才会在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比较中,选择我们党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这就是说,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最终作出什么样的政治选择,关系到我们党是否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这是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结论,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也必然是如此。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也是保证马克思主义自身在不断发展中始终充满生机的基本条件。

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4](第 681页)。这句话反映了一切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

一种理论,如果不需要发展,不可能发展,或者不允许发展,那它就不是科学理论,而是迷信,是宗教教义和信条。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发展,至少应当包含三层意思: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对前人积累的积极思想成果的发展和超越;第二,他们毕生都在发展和完善自己在 19世纪 40年代创立的理论,在迅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中,他们始终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严格地审视自己作出的各种论断,及时纠正那些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形成的不符合实际或者已经过时的结论,努力提出适应新形势的新观点、新思路、新策略;第三,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理论视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第 742-743页)。因此,他们对后人提出的最殷切的期望和最严肃的要求,就是在实践中继续发展他们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后人的这种期望和要求,鲜明地反映在他们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研究和科学预测之中。他们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在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在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的同时,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前瞻性的论述。但是,他们始终反对详细具体地对未来社会制度作出预言,并从这一角度一再批判那些力图"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者[8](第 724页)。同时,他们也批评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热衷于设计未来社会蓝图的理论家们。1881年 1月 6日,荷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纽文胡斯写信给马克思,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者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应当首先采取哪些立法措施?纽文胡斯请求马克思作出回答,并且准备把这个问题提交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对此,马克思在复信中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惟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4](第 643页)。恩格斯的态度同马克思完全一致。1893年 5月 11日,恩格斯在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9](第 628-629页)。可见,恩格斯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原则性的论述;至于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以什么具体方式实现,恩格斯不可能也决不愿意作出回答。他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说到未来社会可能遇到的问题时明确表示:"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4](第 642页)。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任务主要在于指出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如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那将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未来面临的任务,一切都将取决于人民群众未来的实践,而他们自己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述,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只是为后人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写了大量著作,但他们并没有写过一部专著来全面论述资本主义以后的未来社会。他们决不为未来社会规定具体细节,决不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因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4](第 337-338页)。在没有实践的情况下设计的蓝图,"越是制定得详细周密,就越要陷入纯粹的幻想"[8](第 724页)。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需要未来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去制定,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需要未来的共产党人带领广大群众去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需要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去研究,去创新,去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后人的期望和要求。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 150多年历史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后人的这种期望和要求,决不仅仅涉及学风问题,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来说,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主义实践在不断地发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应当不断前进。我们要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发展作

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没有与时俱进、除旧布新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高歌猛进、万象更新的事业。恩格斯曾经反复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应当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第 284页)。因此,每一个时代的共产党人都肩负着进一步发展科学理论的神圣使命,都必须通过勇敢的实践和深入的思考,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注入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历史内涵、新的实践经验、新的理论创见和新的文明成果。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源头活水,成为死水一潭。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他还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 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第 258- 291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深刻认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正是这种深刻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实践证明,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都深刻地认识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坚持的关键,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前提。在坚持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坚持,通过这种反复实践、不断深入的辩证运动,马克思主义才能始终贴近人心,才能在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中始终保持鲜明的当代性、现实性和前瞻性。我们党正是在这种认识和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光辉成果。在新的征途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倡导和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敢于否定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敢于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敢于打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魄力、胆略和远见卓识。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点,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风采和优秀成果

列宁曾经指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1](第 336页)。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它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史学、教育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民主性精华,同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武器和全人类精神财富的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有着紧密联系和相通之处。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党的杰出代表不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坚持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剔除封建性糟粕,继承民主性精华。他们善于从中华民族文化成果中,汲取含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精神的思想智慧;善于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中的道德内涵,从历代人民群众所推崇的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笃学慎思、自强不息、勤勉廉洁、急公好义、崇尚气节、鄙弃贪佞、扶危济困、诚实守信、择善而从、知行统一等优秀品质中汲取营养,形成共产党人特有的思想境界。同时,他们也善于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概,广泛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使中华民族文化焕发出崭新的时代精神,融入人类文明的进步潮流。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能够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而且在运用的过程中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带有彰明较著而又亲切自然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脉相承,同时也与中国优秀思想文化熔铸为一个整体,从而成为在思想内容、论证方式、表述形式和语言风格等各方面都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崭新理论形态。

实践证明,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精华和“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革命文化,不仅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形式。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都十分重视对民族文化成果的批判继承,并且亲自倡导,亲身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以特有的魅力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当前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工作中应当特别注意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新的历史时期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的卓越成果

8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已经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没有完结。世界和中国的面貌日新月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永无止境,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必然要在解决新的课题、应对新的挑战、经受新的考验中不断向前推进。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实践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新问题,把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等重大问题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新的世纪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这是一座新的丰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抓住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用极其精炼简洁的语言,科学地论述了在充满挑战和变数、同时又充满生机和希望的21世纪,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从而保证自己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就必须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中国最大的、最本质的实际,就是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相对落后,这种状况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抓住这个全局中心,发展这个伟大事业,关键在党,因为我们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的建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兴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基于对这种形势的战略分析,基于对党的历史使命的战略思考。进入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国内外复杂形势的严峻考验。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要经受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经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各种复杂情况的考验,经受经济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各种风险的考验。这是我们党过去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时从未遇到的挑战。同时,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这给党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对这一系列挑战的及时回应;它从新的实际出发,回答了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这种丰富和发展,最鲜明地体现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指导治党和治国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形成执政党建设的崭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核心内容和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党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问题。如果失去了先进性,如果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不能走在时代前列,党就不可能有凝聚力和号召力。这一点,在党执政以前是如此,在执政以后更是如此。江泽民同志指出,为了使我们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精辟论断的每一个方面都渊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认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10](第191页),是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

极原因和伟大动力。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的精神现象,是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和制约的,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4](第 691页)。先进文化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动力,人类在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第 283页)。以上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即关于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观点、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观点、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表述中得到了十分完整的体现,并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

对于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观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曾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作过精辟的论述。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也曾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运用这些观点来指导我们党解决实际问题。"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贡献在于:

(一)它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既重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又重视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一切因素、特别是上层建筑中多种因素的重要作用;既尊重像"自然过程一样"发展的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4](第 697页),又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这样就准确地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精髓,摒除了从观念出发解释历史的唯心主义,同时又避免把经济因素是决定性因素这一科学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言论"[4](第 696页)。江泽民同志说,"三个代表"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统一的整体。这一论断反映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的运用。

(二)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结合的原则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当代世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联系当代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潮流,联系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对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对先进文化及其前进方向、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及其实现途径,作了全新的阐述,使唯物史观充满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鲜活的生命力。

(三)它把历史唯物主义直接运用于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把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统一起来,使这种认识升华为指导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理论,并运用这种理论对我们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作出新的概括,科学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新形势下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先进性、以及怎样保持这种先进性的重大问题,从而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指针。

(四)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形势下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经验的结晶,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锻造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进程中,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借鉴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思想财富,运用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留下的精神遗产,来启发人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和语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式的。它蕴含着深邃缜密的马克思主义哲理,同时又具有完全中国化的言近旨远的形式,因而很容易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所理解和执行。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阐述"三个代表"思想时,直接引用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证明党的领导干部对待人民事业应有的襟怀和节操。这一段论述使大家感到切中肯綮而亲切动人。这个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华民族智慧的融合,传统思想菁华和现代文明成果的交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也是"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个代表"思想实现了唯物史观与建党学说的统一。它既是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又是共产党人的哲学信念。它在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方面的意义和影响,将会在党的建设的实践中日益显示出来。

1874年,恩格斯论述德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前途时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之所以能站在国

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是因为他们“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并使这种理论“深入他们的血肉”;第二,他们重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并“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避免可能发生的失误和挫折[11](第 635-636页)。恩格斯关于确保工人阶级政党站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条件的论述,也适用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今天,我们党所处的环境之复杂、承担的任务之艰巨、对世界的影响之深刻,是当年的德国工人阶级政党所不可比拟的。我们党善于在逆境中开辟新的境界,在低潮中推进历史潮流,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显示出恩格斯所强调的那种优越性。我们有 80年的奋斗历史,有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实践,有国内外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卓越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建设的理论指针和行动纲领,我们一定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 考 文 献]

[1] [俄]列 宁. 列宁选集:第 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俄]列 宁. 列宁选集:第 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俄]列 宁. 列宁选集:第 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WEI Jian-hua
(Central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32, China)

Biography: WEI Jian-hua (1946-), male, Director, Professor, Central Translation Bureau, majoring translation of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Abstract The tenets of Marxism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specific realities. In every link of the process, the scientific tenets must tint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 This is the basic prerequisite for Marxism to enjoy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and w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a country. Thanks to their protracted struggl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come to realize and master this truth. They have defined the task of Sinicizing Marxism and worked for eight decades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ask. MAO Ze-dong Thought and DENG Xiao-ping Theory represent two historical leaps in that process while the important ideas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constitute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in the ongoing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Marxism; sinicization; "three represent's"